

論文與農工的兵萬何

雪 葦 著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2820.78
1004.2
805536

論文學的農工兵方向

著 葦 雪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論文學工的農兵方向

著者	雪	發行人	俞鴻模	出版者	海燕書店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	---	-----	-----	-----	------	-----	-------	-----	------------

★ 有版權 ★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三二一室
北京宣內智義伯大院一五號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總 (66) 1 (0001—3000)

義 主 實 現 於 關

· 著 芳 其 何 ·

這是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所寫的文藝理論批評文字的結集。這裏面有作者對於他自己的過去的文藝思想的檢討，有對於延安文藝界如何執行毛澤東主席的文藝新方向的介紹，有對於前國民黨統治區的某些文藝理論傾向和某些文藝作品的批評，並有特為初學寫作者而寫的談寫作的文章。作者過去主要是寫詩和寫散文，最近數年來卻主要是寫文藝理論批評，而這個集子就是作者自己選存的文藝理論批評文字的全部。

行 刊 店 書 海

目次

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什麼·····	一
文學寫作的方向問題·····	四
文學運動的方向問題·····	一〇三
讀「種穀記」(附錄)·····	一四二
書後·····	一八一

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什麼

一

要明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在中國新文學的建設上作了如何貢獻，它裏面的觀點具有何等樣的正確性；首先得從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來加以考察。那麼，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了什麼呢？

二

我國新文學的歷史，開始於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的『文學革命』運動，首先發難的文章，是揭載於新青年雜誌上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一九一七年一月）和文學革命論（陳仲甫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二年（一九一八）五月，魯迅發表了白話創作小說狂人日記（同

載新青年）纔『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奠下中國新文學堅不可拔的戰鬪基礎。經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新文學得與廣大的社會革命力量相結合，獲取廣大羣衆的支持和傳播，使其影響普遍全國。直到『五四』退潮，與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力量第一次發生分化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獲得最初一步的發展同時，同樣的過程也在新文學的陣營裏進行。這樣，到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爲止，結束了新文學的開創時期，即『五四』時期。

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可恥戰爭之第四年，世界大戰使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奪暫時削弱，遂有中國資本主義一時的向上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此正處在二十世紀戰爭與革命的第一個週期，這一年（一九一七年），和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俄羅斯，就在勝利的進行着驚天動地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着又是歐洲各國革命高潮的到來。相同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第一次大覺醒，我國人民這時也開始了第一次真正從思想上起來的蘇甦，所謂『工農兵學商』雖有不同的認識和不同的深刻程度，但都各自要求解除其被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套上的枷鎖。在這樣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環境之下，我們文學革命運動的先驅者們，特別是以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爲代表的

絕大部分，真如鄭振鐸所說，他們是『紮硬寨、打死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卷導言）然而當時的領導思想（不是個別人的思想）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我們還應當弄個清楚。

五四時期建設中國文學的一般領導思想，當時所明確要求的是要建設一個『新』文學，一個用現代人的話（活人說的白話）來寫現代人的思想（活人的思想）的文學，反對用死人的話（文言）來寫死人的思想（封建思想）的文學；因此，在文學內容上，主張民主主義而反對封建主義，反抗儒家思想對文學的統治；在文學的工具——文字上，則主張白話文而反對文言文，反抗死文字對活文學的束縛；並要以這民主主義的文學取封建主義的文學『正統』地位而代之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都是當時先驅者們的實際功績所在，不能湮沒的。可是，這新文學究竟如何『新』法，這『現代』是什麼樣的現代，那就十分朦朧：從『文藝復興』的文學到『世紀末』的文學，從資產階級革命的文學到資產階級沒落的文學，都是『新』的、『現代』的，都在歡迎之列。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主要提出『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不用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不用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一、二、四條都是有關文學內容的主張，重要的則只是第一條。但他對『言之有物』的『物』是這樣解釋的：

「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

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這裏，「情感」和「思想」都是只解釋得個名詞本身，此外就沒說明些什麼。過了一年多，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不過把這「八不」概括成「四條」：「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在內容上並沒有什麼進展。甚至於說，他「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換句話，他所着眼的就只「白話」兩個字。但是就連這個，也表現了很大的軟弱性。●陳仲甫的文學革命論（一九一七年二月）在戰鬪的意義上蓬勃得多。他聲言：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然而主要只說明了應被打倒的一面，即是所謂：「此種文學，」「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至於正面主張，幾止於寫出幾個口號。

到第二年（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在他寫的『本誌（即新青年——雪）罪案之答辯』裏，才更明白些說明：其所以要反對封建文學，是爲了擁護科學和民主：

『要擁護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但也就止於這裏了。周作人底人的文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新青年五卷六號）是被大家公認爲五四文學革命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卷的導言裏，還說『這是篇最平實偉大的宣言，它的詳細節目，至今（一九三五年）還值得細讀』的，可見確是足以代表當時一般領導思想的最高水平了。這裏確也乾脆的提出了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不過也止於解釋出個抽象籠統的原則：

『我所說的人，乃是「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人的理想生活，……首要便是改良人類的關係，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用這人道主義爲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文學是被安置在現實的人生社會上面了，但是沒有具體的方向，對我們這時代，這社會

以及社會裏的這些「人」都沒有具體的認識。這就是『五四』先驅者們的一般限界。所以運用到寫作實踐方面，就把一切都當作「材料」，只要是社會上存在的都行；也不要什麼立場觀點，只要是從「實地觀察」得來的都對。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就是這樣說的：

「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醜陋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想象）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這樣的情況，直到第一次發生新文學陣營內部的分化為止。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及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分化內容，就是激進的革命知識分子更激進，更加革命化；而改良派則趨於和舊勢力（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妥協，離開革命陣營，甚至於反革命。這結果，在政治領域裏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文學領域裏，就其所代表的思想意義來說，則是文學研究會的產生（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工人階級的參謀部，一開始就明確的爲中國人民訂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以工人和農民爲骨幹，號召一切革命的階級團結奮起，並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爲這時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已經結束，其對中國的壓迫又「捲土重來」，外來壓迫的增加，反映在國內反動勢力的擡頭和封建軍閥統治的野蠻性上；「五四」羣衆運動也開始退潮，潛入社會深處發展；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已經勝利，並進行了頑強有力的國內戰爭，鞏固了蘇維埃政權，而這勝利是無產階級的勝利，勞動人民的勝利；這使得我國的勞動人民受其影響（首先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更加深其革命的覺悟。這樣，一方面是壓迫力量的加強，殘暴者更加殘暴；另一方面是革命力量的深入，進步者愈向前進步。這就是形成這次分化之內外背景。從這時起（一九二

一、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又發生第二次的更為深刻的分化為止，在政治上是大革命的準備和實行；在文學上，則與此步調相合，是新文學的第一個發展建設的時期，文學研究會的時期。在這裏，新文學之開創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一般的領導思想上，得到一個進一步的解決。

作為對「五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之解決，首先是更明確化了時代和文學的關係，特別是時代和作家的關係。

「一個時代有一個環境，就有那個時代環境下的文學。環境本不是專限於物質的；當時的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都是那時代的環境，著作家處處暗中受着他的環境的影響，決不能夠脫離環境而獨立的。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祕奧的神祕詩人……就是並不提起他的環境，但是他的作品，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環境有關；即使是反乎他那時代的思潮的，仍舊是有關係。因為他的「反」，是受了當時思潮的戟刺，決不是憑空跳出來的。」（沈雁冰：文學與人生）

其次，從這樣的理解出發，進一步肯定了文學是「為人生」的，而且要改造這人生：

「……我們希望文學能够擔當喚醒民衆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國內的文藝的青年，再不要閉了眼睛冥想他們夢中的七寶樓台，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在住在豬圈裏。我們尤其決然反對青年們閉了眼睛忘記自己身上帶着鍊鎖，而又肆意譏笑別的努力想脫除鍊鎖的人們……」

『巴比塞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爲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着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爲目的的。」國內的文藝青年呀，我請你們再三的思量巴比塞這句話！』（沈雁冰：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

因此，進一步在寫作方向上提出作家應該着眼的是社會的困苦，前進與保守的鬭爭，描寫社會的黑暗，同情被壓迫的人物——

『真的文學也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我們現在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社會背景？應該產生怎樣的創作？由淺處看來，現在社會內兵荒屢見，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了；反映這時代的創作應該怎樣的悲慘動人呀？如再進一層觀察，頑固守舊的老人和向新進取的青年，思想上衝突極厲害，應該有易卜生的少年社會黨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一樣的作品來表現他。……總之，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與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裏更應該注意這社會的背景。』（沈雁冰：社會背景與創作。）

『注意社會問題，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

這就是說，不只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而且文學必然是與當前的時代息息相關的，所謂『新文學，』就是『爲人生』的文學，所謂『人的文學，』就是描寫社會痛苦與社會新舊勢力鬭爭的、同情社會下層人物的文學。從這個出發，他們反對『鴛鴦蝴蝶派，』

也反對『世紀末』的資產階級沒落文學，不管『唯美派』也好，『頹廢派』也好。從『五四』時期來看，這在『新文學』的思想發展上，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單說個『爲人生』，也還嫌籠統的。『人生』是階級的人生，你爲的是那一階級的人生呢？爲資產階級的人生嗎？還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人生？抑是爲工農的人生？單說個『同情』（這個『同情』本身的問題還不說）被壓迫者，也同樣是含糊的。被壓迫者也有種種，你主要『同情』那一個呢？小市民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嗎？工人農民嗎？程度雖有不同，但都是受着壓迫的。甚至民族資產階級，也還受着帝國主義與買辦官僚資本的壓迫呢。——這都是一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同樣沒有在這裏得到解決的，須待第二次的分化——階級大分化的到來。①

中國革命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分化，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巨大而深刻的分化。這分化的起因，是由於大資產階級篡奪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帝國主義的分化進攻政策；分化的內容，是資產階級的叛變革命，投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血洗中國共產黨與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羣衆——大革命的恩人；其結果，則是中國革命中各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人不能不獨立來繼續領導中國革命，堅決依靠農民與團結小資產階級，頑強的拿起武器來防禦自己以抵抗屠殺，用武裝的革命以反對武裝的反革

命。所以，資產階級在內的「全民革命」沒有了，一般的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思想也具體化、鮮明化了；代之而起的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②大革命時期的前進作家們，既大部份都親身參加了這一革命過程，其結果當然不能也不在文學領域裏引起同樣巨大的分化。文學領導思想的新進展與文學陣營的重新結合。這結果，便是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一九三〇年三月）。用魯迅的話來說，這情形就是：「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羣衆，而剩下的青年們再入於被壓迫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上海文藝之一瞥——全集第四卷，二八三頁。）

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就是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三個時期，「左翼十年」的時期。這一時期文學領導思想的一個很大的進展，就是從文學的進化論觀點的認識具體到文學的階級論觀點的認識；當前的社會是階級的社會，在階級社會時代，社會的進化是通過階級鬥爭來進行的；那末，文學就不是一般「時代的反映」或「人生的反映」，而是階級思想、階級鬥爭的反映；因此就不是一般的「爲人生」，